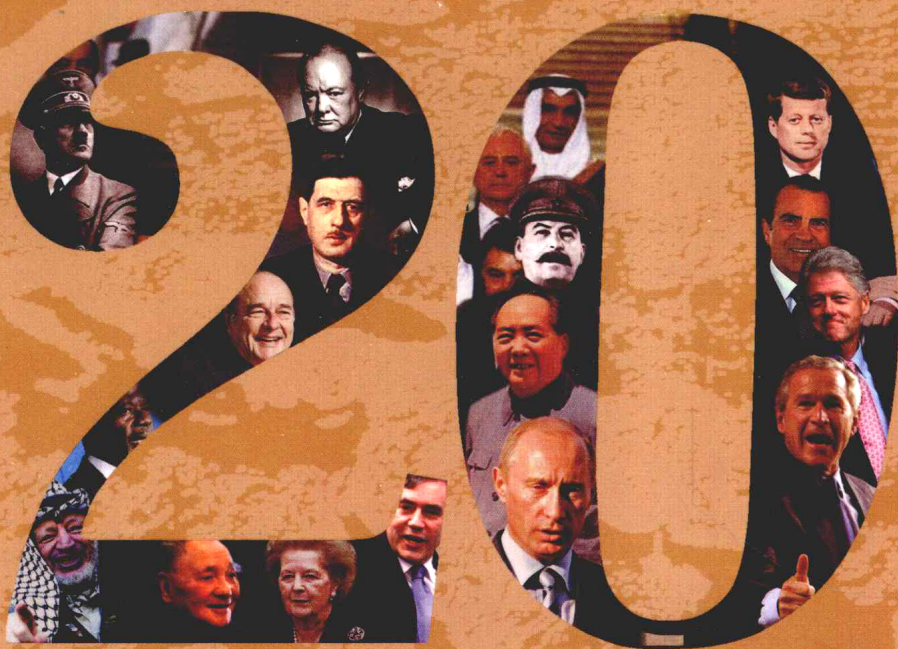


谁主宰20世纪,谁将领导21世纪



世纪 的世界

1900年以来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ND BEYOND

牛津第5版

[美]威廉·R·科勒 (William R. Keylor) /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20

世纪 的世界

1900 以来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

牛津第5版

[美]威廉·R·科勒 (William R. Keylor) /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的世界：1900 年以来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 / (美)科勒著；王宝泉译.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56-151-9

I. ①2… II. ①科… ②王…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20 世纪 IV. ①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6761 号

20 世纪的世界

出 版 人 范 芳
责任编辑 盛利君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www.qypublish.com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封面设计 子木唐工作室
印 刷 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5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256-151-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5版序

本书第一版的编写始于1984年,当时是基于我在大学教授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历时十余载,迫切感到有此必要。那时并不缺乏探讨20世纪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关系的合体可用的教科书,但是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史学家开始对用单一的国家 and 地区方法研究他们的课题存在诸多的内在限制表示不满。他们坚称近现代世界的主权政治单位或地区亚体系彼此是那么联系紧密,并且互相依存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于那些研究国家间对外关系的人必须具备一种全球或者国际视野。这种新的方向使得那些超越狭隘的国家 and 地区研究方法来探讨国家间关系的学者趋之若鹜。由于从近来解决的一些国家先前根本无法涉足的政府分类档案获取的大量信息,这些论著和略失偏颇的综合论述的作者对我们对20世纪国际进展的理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颠覆或修正了较早著作一度被认为是明确无误的判断。然而,尚无大学层次的教科书将全球或国际领域近来的这些专业研究成果一一包括进来。我在本书有此尝试,以此表明不惮于擅用和提出个人见解所引发尖锐的学术矛盾,我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知识似乎坚定了我对提出那些见解的信心。

在最近20年的教学生涯中,国际史已经成为一门蓬勃发展的学科。大学本科阶段的国际史课程,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一些专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旨在从开阔的视野提升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在美国,对研究对外关系的历史学家来说,用过去的方法进行专业研究——只将注意力集中于所谓“从华盛顿的观点看”的批评,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运用真正的国际视野正面临着挑战,正如我在为修订本书做准备过程中所发现的。笔者如此自不量力地承担编写这样一本始于20世纪初的整个世界通览,马上感到自己捉襟见肘,如同一个人面对着专门论述某些课题的浩瀚的素材,竟然不晓得如何如何筛选出自己专业领域的信息。一个学会如何完全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的人,是站在别人最初的研究的肩膀上,那是一些将整个研究生涯奉献于别人要么完全视而不见、要么仅仅朦胧地意识到的历史进展上的人。当一个人耐心地在這個广袤而又陌生的领域耕耘时,这个人必须心里牢记将间接素材中的纷杂事实和阐释纳入到他研究中的组织纪律,以便使一本较高级程度的教材能够条理清晰和明白易懂。

简单地说,我的意图是在纵论20世纪世界列强为了势力、繁荣和威信进行角逐这个分析框架结构内融入叙述性的元素。这个指导方针的主要优势在于其排他性,使得作者能够跳过在历史教科书中经常占据突出位置的话题,以便集中阐述那些与根本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事件和过程。譬如,本书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单一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史上。诸如单一国家的国内发展情形仅当其在国际范围里发挥显著作用时,才予以简要阐述。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经常不被注意或者在绝大多数“外交史”中只是粗略提及的话题,本书将予以详尽阐述。

例如,我在本书中尽可能内容详实地覆盖到了国际经济关系,特别强调了贸易类型、资本流量,以及为争夺原材料所展开的竞争,还有这些经济势力与基于政治和战略优势进行国际竞赛之间在很大程度上的联系。

需要向读者解释的是我对中文名字的拼写。自从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罗马字母拼音体系转写中文名字以来,严格认真的作者有责任修正过去熟悉的名字写法以适应这项新规定。因此,在本书中Mao Tse-tung变为Mao Zedong,Chou Enlai变为Zhou Enlai,Peking变为Beijing,Sinkiang变为Xinjiang,等等。然而,我决心在很少的情况下抵制这种转化成拼音的做法,诸如没有将Chang Kai-shek变为拼音的Jiang Jieshi,这些已经习以为常的旧时拼写似乎阻碍了对拼音的认知。

我的几位朋友和同事的意见和批评在本书的前几版中都有所体现。诺曼·奈马克仔细阅读了本书第一版的手稿,并纠正了严重的错误和经不起推敲的解释,特别是关于苏联和东欧的内容。赫尔曼·弗雷德里克·埃尔茨也通读了我的全部手稿,并通过他对中东广博的学术知识加强了我对那个错综复杂地区的了解。迪特里希·奥洛详核了本书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局势的部分,并对德国对外政策的论述提出了特别有帮助的建议。约翰·加拉尔多和阿诺德·奥夫纳在两个重要方面为本书定调:第一,作为严肃的学术典范并为教学作出贡献;第二,与我就本书的各章节展开了长时间和富有成果的谈话。在修订本书第二版时,我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麦克凯恩答应我的请求,阅读并对非洲大陆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后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的篇章给予有益的评价。

那些在教学中使用本书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向我转达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学生)的意见,并提出有益的建议以便在第三版做出改进。值此之际,我特别向兰斯洛·法拉尔、卡洛尔·芬克、戴安娜·昆茨、卡沙尔·诺兰和史蒂芬·舒克尔表示感谢。

我与自己所在机构之外的组织的联系,使得我长期以来能够密切关注其他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成果。就在不久前,让·巴普蒂斯特·杜罗塞尔教授诚挚地邀请我参加他在巴黎大学开设的关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生讲座,我从他的几位学生范围广泛的讨论中受益匪浅。我也从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获益良多,长期以来该研究中心始终作为展示博士研究生和颇有建树的学者的著作的论坛。

本书第三版于1996年问世后,我荣幸地享有与两个小组研究国际史的学者和博士研究生进行密集的智慧交流的特权。保罗·肯尼迪诚挚地邀请我参加由国际安全研究协会赞助的在耶鲁大学召开的“国际史近阶段研究成果”年会,我从那些博士研究生和几所大学的教授的研究发现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与此同时,我与一些有共同志趣的同事——伊戈尔·卢克斯、戴维·迈尔斯,特别是卡沙尔·诺兰——在波士顿大学建立了国际史研究所。埃里克·戈德斯泰恩在来波大担任国际关系系主任后,俨然成了一个热心的同道。自此以后,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已经赞助召开了几次学术会议、公开讲座,以及由系里的教授和研究生宣读论文。国际史研究所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共同就几个学术项目展开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我的朋友和同事安德鲁·巴塞维奇对我来说是一个取之不竭的智慧源泉。我在波士顿大学的另一位朋友和同事戴维·弗罗姆金,诚挚地邀请我参加由他领导的帕尔迪未来研究中心召开的几次给予我很多启迪的会议。最后,哈佛大学的阿吉拉·伊利耶教授审阅了本书第四版,凭借他在国际关系史方面出类拔萃的知识为

本书需要改进之处提出了不少建议。最重要的是,他富有见地地指出我应该多注意非政府角色在现代社会的角色,这是本书前几版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的方面。

在我为修订第四版做准备时,牛津大学出版社长期负责编辑我的文稿的南茜·莱恩在这家学术出版机构度过了杰出的编辑生涯后退休了。在此,我谨对南茜多年来的不懈支持表示敬意。乔亚·史蒂文斯以及其后的丽莎·格赞运用娴熟的技巧卓有成效地驾驭手稿,证明是南茜·莱恩合格的继承者。我现在的编辑彼得·科文尼建议我对本书的某些篇章做大幅度修订,显示出过人的智慧和认知能力。本书第五版之所以能够面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耐心征询我的意见。在他离开出版社后,本书第五版正准备出版,而朱恩·吉姆则凭借娴熟的编辑技巧和高效挑起了这副重担。

我的妻子莱塔一直是本书多次修订过程中,我能在重任下坚持下来的巨大精神源泉——不论是内在还是外在的。自从1968年春天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结识以来,她始终是我珍视的谈话伙伴。本书也献给我儿子丹尼尔和女儿贾丝汀,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后,赋予我的生活更深刻的意义。

作者

前言

21 世纪初国际关系的全球背景

世界的欧洲化

20 世纪国际关系最突出的特点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处在若干国家的直接或间接的统治之下,而这些国家又在同一个地区:即西濒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的所谓欧洲。16 世纪,当航海技术的改进使得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法国的海洋探险者能够与新近发现或未发现的远方大陆——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建立起联系并提出领土要求时,欧洲权势便开始膨胀,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接着,欧洲陆续在这些海外海岸建立起殖民地来,掠夺宝贵的经济资源:譬如美洲的贵金属、糖和动物皮毛、远东的香料以及非洲的黑人奴隶。

20 世纪中叶,美洲宜人的气候和大量的可垦土地吸引了欧洲大量的殖民者,他们从大西洋彼岸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政治独立,并忙着致力于在他们继承而来的或申请获得的土地上促进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这些统治美洲的欧洲移民带来了欧洲的政治制度、经济实践、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使得这些美洲国家具有浓重的欧洲色彩。同期,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人向亚洲的西伯利亚迁移,使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也染上了欧洲色彩。最后,在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初十年这一期间,之前在欧洲权势之外的南半球亚非地区也成为了他们筹划殖民的对象。欧洲列强四处扩张的漫长进程在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一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世界,而欧洲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正是在上世纪末,政治家、外交官和军事领袖们开始在全球背景下谈论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

对 19 世纪后半期帝国主义急剧扩张的解释在该领域的历史学家中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历史学家强调西方人^①为工业生产和资本寻找海外市场的经济利益以及国内短缺原材料的重要意义。一些人则关注基督传教士的活动。这些潜入殖民地寻求拯救当地人灵魂的传教士在遭到本地无信仰者的暴力抗拒时反而寻求母国政府给予军事保护。另一些人把战略优势的前景——在土著居民中征募新兵以及作为海外军事行动的基地——看作海外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还有一些人强调国家荣誉和寻求国家威望所扮演的角色。但是,不管帝国主义的原驱动是什么,其结果却是显而易见:欧洲权势和影响扩展到了整个南半球。

以这种方法首先达到“世界大国”地位的两个国家是英国和法国。两国都在第一次欧洲帝

^① 在这一研究中,“西方”这个术语指的是居住在北半球的欧洲人和欧洲血统的移民。

国主义扩张浪潮中在广大的非欧土地上建立起海岸据点;英国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为缓解人口过剩,向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适宜居住的海岸输送了大量的国民。在早期占据拉丁美洲、非洲和太平洋的一大堆岛屿和海岸据点后,19 世纪中期,英国有效地控制了印度次大陆。那时,法国把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纳入到其 17 世纪残留的帝国。

但是,只是在苏伊士运河(1859~1869 年由法国人开通,1875 年在英法联合的金融控制下)开通后,伦敦和巴黎当局才开始热心地推动帝国主义扩张事业。从此,经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航海路线——比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的路线来得安全和经济——被英国统治阶级看作是通往其亚洲殖民地的“生命线”。在真正意义上它确实是一条生命线:自从 19 世纪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后,大不列颠通常只生产其民众消费食品的 30% 以及甚至比其工业所需还少的原材料。有相当比例的粮食和工业原料进口自亚太殖民地(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且这个海岛国家的生存看来依赖于其保持运送这些主要供应的海上交通线畅通的能力。此外,为了支付这些庞大的食品和原材料进口,英国的制造产品必须确保进入海外出口市场的畅通渠道。由于这些原因,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统治阶层认为通往远东的海上交通线必须牢牢地控制在英国的手里。这意味着英国不仅要保持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一线的海上霸权,而且要在沿途建立战略基地和补给站。

19 世纪末,如何保护通往印度、东亚和澳大利亚的问题困扰着英国,为此,英国不仅沿着亚洲南边和非洲东海岸夺取了一连串岛屿、海岸据点以及它们的腹地,而且还控制了连接两大洲的埃及陆上通道以及连接着海洋的苏伊士运河。正是这些大英帝国的战略前哨——地中海的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和苏伊士运河;红海沿岸的亚丁和索马里兰;印度洋周边的肯尼亚、印度缅甸和新加坡——使得这个小岛国能够成为并有效地保持着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帝国。

除了追求粮食、原材料、海军基地和供给站外,第三个刺激英国帝国主义的因素是为在工业企业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利润资本在不发达地区寻找投资场所。新近向欧洲渗透开放的亚非地区急需吸引大量的投资资本来建设交通和通讯系统这两个实现经济现代化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伦敦的大金融机构很快开始的大力投资铁路和公路建设、改善海港口岸等活动以及其他由英国企业所从事的投机活动成为殖民主义初步进程的一部分。很多英国投资商因此认为他们经济上的利益取决于帝国能否保证这些资本投资市场的畅通。

道貌岸然的维多利亚绅士为英国权势的大肆扩张行为提供各种各样辨护理由。很多人认为英国负有为殖民地未开化的落后民族提供英国先进文明成果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基督教的激励精神和开明的政治统治。无私的传教士和理想的公务员似乎确实想象他们是在把非欧世界的土著居民从迷信原始宗教和野蛮的民族风俗中解救出来。但是在本质上,所谓“白人负担”的自我辩白掩不住英国殖民扩张背后主要出于经济利益考虑的动机。尽管鼓吹宗教皈依和政治改革,但英国的殖民政策是尽量保持殖民地原有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原封不动和完好无损。伦敦所关心的是使得大不列颠,假若不是其民族存亡,也是其经济繁荣所依赖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网络高效运作的帝国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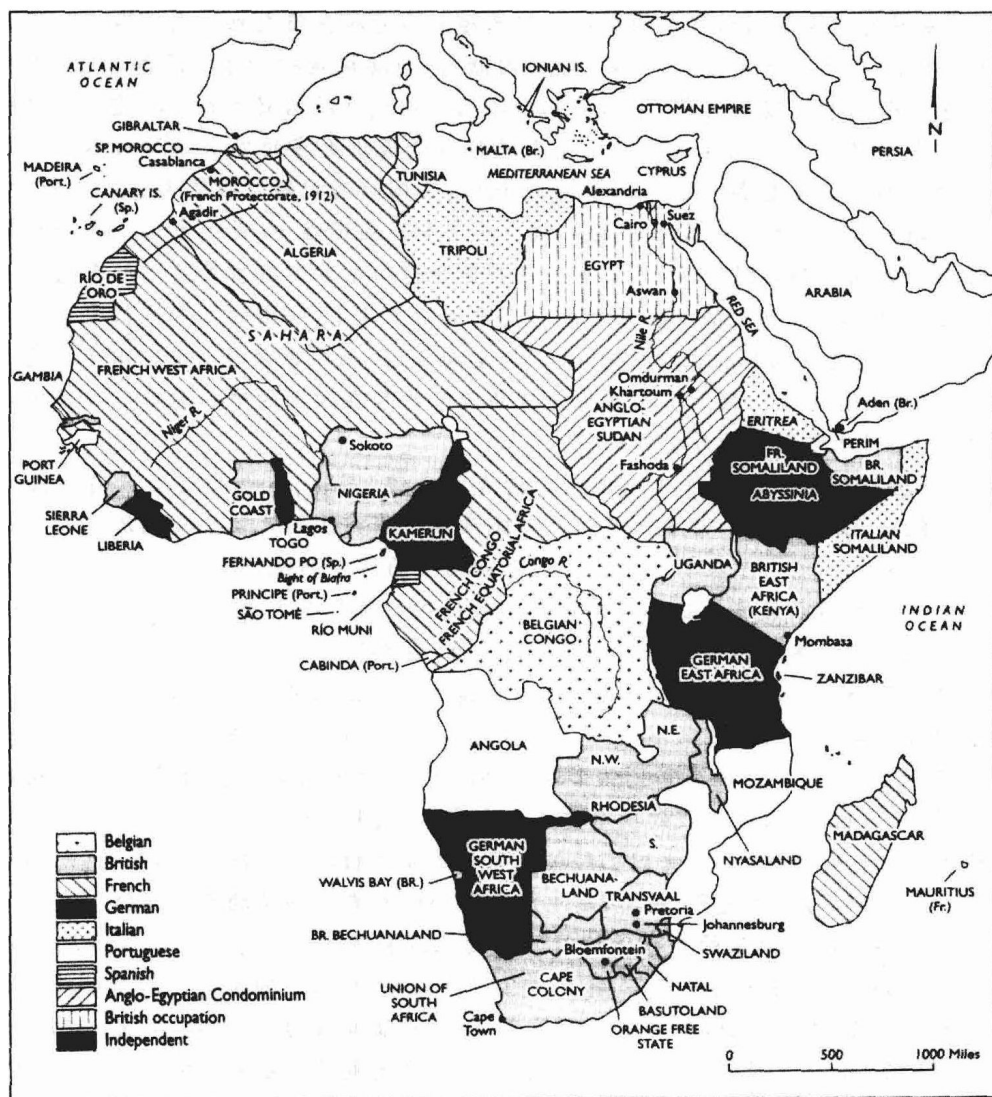
19 世纪后半期法国成为殖民主义帝国的原因较不明显。由于粮食上的自给自足,以及在工业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经济的发展与英国相比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既然法国不能生产出足够多的制造品,也不需要进口粮食,那么它也没有明显的动机去寻找海外市

场。法国金融界也不像英国银行机构那样为积累起来的资本在殖民地寻找出路。总的说来,法国于1871~1914年间投资于海外的那部分国内储蓄,与其说是投资于遥远的南半球,不如说是流入了东南欧国家的国库里去了。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政治混乱各阶段建立的政府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在为国内企业在遥远的土地上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而不是自己进行更多的投机活动。更为重要的是,与英国政府相比,法国政府把对外投资看作一种外交手段,更为积极地推动私人资本进入发展中的东欧地区。如果法国在19世纪最后十年渴望成为殖民帝国没有很好的经济动因的话,那么其把经济资源转向东方则有着外交上的考虑。普法战争(1870~1871年)后,欧洲大陆处在强大德意志帝国的主导下,法国的弱势地位要求其全神贯注于大陆事务。通过鼓励私人资本投资于俄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初生国家,法国政府努力使依赖于法国财政支持的国家对其在欧洲的唯一对头——德国——形成包围之势,并因此增强它的外交影响力。

然而,尽管法国在欧洲专注于德国对其造成的威胁,同时,它也积极进行着殖民扩张运动,到20世纪初,法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研究法国帝国主义的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这一悖论,他们强调一个在贸易结构或资金流动方面得不到统计证明的刺激因素的作用。这便是追求无形的国家荣誉。1871年,法国突然被德国所替代而失去了其在欧陆的霸权地位,它便通过征服非欧世界的领土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这些远方地区的当地政府由于缺乏政治组织和军事力量而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并不是指在巴黎的政府(在批准这一殖民政策上它显得迟疑不决并有点不大乐意),而是指在殖民地追求自己特殊利益的军事将领和商人们。一位观察家竟然形容法兰西帝国是“无聊的军官为寻求兴奋”而建立起来的,或许他应该把“追求赚快钱的铁路建造者和商人”也包括进去。

无论如何,到20世纪之交,法国已经控制了将近1/3的非洲大陆、东南亚的一大部分(在政治上统称为“法兰西印度支那”或“法属印度支那”)以及南太平洋的几个岛链。在德意志帝国致力于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时,法国已经和英国一起争夺控制其余的非欧世界了。为了把法国的注意力从欧洲事务,特别是从普法战争后,法国因丢失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对国家荣誉所造成的仍未愈合的伤口上移开,德国欧陆霸权的设计师——奥托·冯·俾斯麦首相鼓励法国的帝国主义便不让人感到奇怪了。同时,考虑到英法要求夺取的殖民地相互重叠,这又能增强英法紧张关系的可能性,也因此降低了英法在欧洲联手反对德国霸权的可能性。

然而,到19世纪末,又有两个欧洲国家加入英法的行列,试图在这场瓜分非欧洲世界的狂潮中分到一杯羹。第一个国家就是德国。在俾斯麦1890年退休后,德国年轻而又鲁莽的皇帝——威廉二世越来越不满于前首相的“大陆政策”。这一有效保持德国在欧洲霸权地位的策略在帝国主义时代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英国和法国正迅速地把大片有着数百万人口和有着无数不知名珍贵资源的殖民地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1897年,这位德国皇帝宣布他的国家将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欧洲角色而引起轰动。从此,德国将实施一项“世界政策”,计划使德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参与到世界范围争夺世界帝国的竞争中去。当英国自诩为“日不落帝国”时,威廉二世宣布德意志帝国将要获得“阳光下的地盘”。在短短几个月内,这一大胆宣布很快化为实际行动。德国已经制定了计划要建造一支能够在公海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并夺取了中国在黄海的港口胶州湾作为其将来远东舰队的补给站。自1871年成立以来,德意志帝国已经在欧洲事务上充当仲裁人,如今突然告知其他大国它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活跃



► 到 1914 年为止欧洲对非洲的渗透

的角色。

这个欧陆强国挑战英法在非洲和亚洲帝国利益的后果正是俾斯麦所担心的。这位皇帝的“世界政策”促使了英法领导人在反对德国充当世界领袖的共同利益上解决了它们在殖民地领土上的争端。最重要的是法国也想获得英国的合作以遏制德国权势在欧陆的扩张。英国也想在反对德国新近形成的海军和殖民野心上得到法国的支持。而阻碍英法达成双赢谅解的障碍是双方在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沿着地中海南岸形成的对立。英国控制了通往地中海的两个通道(通过西端的直布罗陀和东端的亚历山大两个海军基地)与法国在摩洛哥以及追溯到拿破仑时代以来在埃及的新老帝国利益构成了冲突。1904 年 4 月,两国终于为结束它们在北非的对抗达成了友好的决议。法国通过承认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并保证法国能够通过苏伊士运河)来换取英国同意法国对摩洛哥的安排(法国同时保证不染指临近直布罗陀的缓冲区并最终移

交给西班牙)。1906年3月,在一次召集各大国评判德国挑衅法国在摩洛哥要求优先权的会议上,英国政府坚定地支持法国使得德国不得不打退堂鼓。两个月前,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阁下采取不寻常的步骤,授权英法的总参谋部进行对话,以期在欧洲大陆可能爆发战争时进行战略协调。尽管英国很小心地提醒法国,英法协约并不是联盟,并不意味着英国有义务保卫法国,但是这两个国家开始展开紧密的合作,努力抑制德国权势在欧洲和殖民地的扩张。

在19世纪后半期推行帝国扩张政策的另一个欧洲大国是俄国。当西欧的航海国家把它们的权势扩展到世界各大洋时,俄国的斯拉夫人也向东越过乌拉山进入到广袤的亚洲空地。就如北美的土著居民无法阻止美国残忍地把它的边境线从大西洋沿岸扩展到太平洋沿岸一样,有着不同宗教、语言和传统的异族也因为缺乏军事抵抗力量而屈服于俄国的统治。但是当沙皇俄国把边境线推进到欧亚大陆外的公海——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时,它便开始触犯到其他扩张主义国家的利益。尤其是英国决意保护通往其亚洲殖民地的海上通道因而全力阻止俄国在沿线上获得霸权地位。这样,英国经常与法国一道推行该政策,使得俄国面临着最为不利的地缘障碍,这对意欲称霸世界的俄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冬季,当冰雪封住了她在波罗的海、北太平洋和北冰洋的大多数大港口时,俄国便缺乏足够的海港来容纳它的舰队和商船队。

俄国主要的终年不冻港都位于黑海。但是连接这些港口和地中海的狭窄水道——即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它们在外交上统称为“海峡”——将随时会被控制海峡两岸的大国关闭。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大国一直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土耳其对“海峡”和邻近的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使得俄国无法为其对外贸易和海军力量争取到一个安全的出海口。正是为了打破这个地缘上的限制,19世纪后半期,俄国沙皇开始在其帝国的西南角推行一项积极的政策,努力扩大其在巴尔干国家中的影响并迫使土耳其政府只向俄国军舰开放海峡。

巴尔干半岛和土耳其海峡在地理上对俄国的吸引也因一种观念上的吸引力而得到加强: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的最大民族团体是斯拉夫人,并且他们对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斯拉夫人有着一种民族认同感。19世纪,这种存在于巴尔干和俄国的斯拉夫人之间模糊的民族血亲情感慢慢地转变成要求政治统一的主张。自从1867年在莫斯科举行斯拉夫人会议以来,鼓吹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人就设想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斯拉夫帝国。但沙皇们对国外斯拉夫人的苦难生活漠不关心,对国内浪漫的泛斯拉夫运动也无动于衷。他们推动和支持这一活动,部分是为了转移人们关注国内困难的视线,部分是为了削弱奥斯曼帝国在南欧斯拉夫人居住地区的主权。土耳其粗暴对待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定期地引起了圣彼得堡强烈的口头抗议以及在俄国宫廷的泛斯拉夫主义空想家们和野心家们摆脱奥斯曼帝国的高压统治的强烈要求。除民族仇恨外,被俄国王室积极利用的还有俄国神职人员对土耳其当局由来已久的宗教不满情绪:四个世纪以来,东正教(俄罗斯帝国的官方信仰)的精神之都(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一直处在土耳其人的控制之下。把圣城从穆斯林异教徒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一直是俄国宗教界的普遍目标。每一则关于土耳其人行为不端的新报告都能使这一长期沉寂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相比,沙皇比较不受大众压力的影响,但是他也不能无视这些民族和宗教情绪,尤其是当这些情绪恰好有利于增加俄国在挑战土耳其地位时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这些内部压力和外部诱惑促使了俄国向地中海扩张,这在外交词典中产生了所谓的“东

方问题”一词。在 19 世纪下半叶,俄国两次试图向南侵犯土耳其。这两次企图都因大国的干预而受阻,第一次是 1854~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另一次是在俄土战争后于 1878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上。在之后的 20 年里,奥斯曼帝国由于放弃了对巴尔干地区斯拉夫人的政治统治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欧洲病人”。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黑山的独立得到了承认,而半岛其余地区则激荡着反对土耳其统治的不满情绪。

奥匈帝国从北部进入这一政治真空地带。虽然它与奥斯曼帝国一样都困扰于民族分裂问题,但是哈布斯堡帝国由于获得欧洲大陆上最强大国家的几乎无条件的支持而具有决定性优势。鉴于 1879 年德奥结成了同盟(三年后意大利加入扩展为三国同盟),德意志帝国承诺维持哈布斯堡在南欧的权势。在日耳曼人共同反对其向地中海扩张的情况下,俄国政府最终被迫推迟它在巴尔干的扩张。1897 年 5 月,俄奥在其他大国的默许下签订了一份协议共同维护巴尔干地区的政治现状。至此,“东方问题”至少是暂时地被搁置起来。

俄国在称霸巴尔干半岛和控制土耳其海峡的野心计划受挫后,开始转而向东扩张。世纪之交,对南亚争议地区的要求在沉寂几十年后重新被提了出来。正如奥斯曼帝国挡住了沙俄通往地中海的通道一样,名义上独立但政治上异常虚弱的波斯^①也挡住了沙俄进入波斯湾。20 世纪初,俄国对波斯的经济渗透,包括以波斯关税收入为担保的贷款、计划建造一条自俄国边境至波斯湾的铁路以及为俄国出口争取优惠的关税待遇,这些都在英国引起了强烈的敌意。英国政府把俄国在波斯获得经济霸权看成是其攫取政治优势的前奏,因此英国将葬送其通往远东的海上通道的安全。更甚者,俄国逐渐地对阿富汗进行商业侵蚀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更大的威胁,阿富汗在传统上是俄国与英国印度之间的缓冲地带。结果,俄国在南亚的扩张处处受到了英国的掣肘。英国对德黑兰政府的外交上施与压力,取消了俄国在波斯获得的金融和商业优势。1901 年,一名叫做威廉·K·达美高的新西兰人获得了整个波斯 60 年的石油开采权,这使得英国—伊朗石油公司有特权独家控制 1908 年发现的丰富油田。在英国游弋在波斯湾的海军舰队和印度驻军的支持下,英国在波斯的金融投资越来越多,有效地挫败了沙俄王室中“波斯派”的雄心计划。

远东成为俄国一个更有前途的扩张方向。正如美国的先驱者在牺牲土著的印第安人和脆弱的墨西哥政府的情况下向西扩张到太平洋东海岸一样,俄国殖民者也跨过人口稀少的西伯利亚荒地到达太平洋西岸,在这一过程中,它征服当地的部落民族,蚕食软弱无能的大清帝国领土。1860 年,俄国夺取了中国的乌苏里江地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港口城市。但是这并没有满足俄国获取出海口的欲望,因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港在冬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冰封状态。为此,俄国扩张主义者再次把视线向南转移。除了土耳其和波斯的阻碍外,俄国自身的政治不稳、经济落后和军事无能也阻碍了其获得一个全年不冻港。但是,与在土耳其海峡和波斯湾的情况不一样,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有能力撑持一个被称为“亚洲病夫”的中国。英国一直充当清政府的保护者(企图通过控制主要的港口在经济上统治中国)也无法阻止其他国家在陆地上对中国的渗透。1891 年,俄国政府在法国贷款的支持下(作为法国拉拢俄国加入反对德国计划的组成部分)开始建造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当铁路建成后,俄国就能把军队从其欧洲心脏开往前线,这使得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抵挡得住这支军

① 波斯于 1935 年更名为伊朗。

队,更不用说中国了。

对俄国最具吸引力的是东亚的两个半岛,它们从中国东北的满洲里向黄海延伸,并能给俄国提供进入太平洋的通道。第一个半岛是辽东半岛,包括在其末端上的、俄国梦寐以求的全年不冻港——亚瑟港(旅顺)。第二个半岛是朝鲜半岛,它是俄国控制黄海的关键并可因此得以控制通往其未来东亚港口的通道。通过占领了这些地方,俄国就能更好地参与到已经对航海国家产生强烈吸引力的中国贸易中来了。

欧洲列强料想俄国军队将在满清王朝覆亡后进入中国北疆填补真空,便纷纷行动起来瓜分这个衰亡中的亚洲帝国。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掀起了争夺经济特权的狂潮,很快显露出了清王朝的虚假主权本质。1898年,俄国趁中国内乱之际从清政府获得了对辽东半岛南部(包括旅顺港)的长期租赁权和建造一条铁路把港口与其正在西伯利亚建造的铁路网连接起来的权利。而中间的满洲里省也成为了俄国觊觎的目标:控制满洲里将确保通往旅顺港和温暖水域的通道安全并且将享有特权开采这里所蕴藏的大量煤炭资源。1900年,俄国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了义和团运动;随后,俄国十万军队驻留满洲里;接着,又要求在朝鲜北部获得更多的经济特权和商业渗透。由于欧洲列强无法派出足够的军队阻止俄国在该地区的扩张,到世纪之交,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即将竣工,俄国称霸中国看起来是迫在眉睫了。

但是,当俄国在东亚扩张时,它便很快发现欧洲列强权势之外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如其所想的有着无尽的扩张机会。特别是当太平洋西海岸的非欧国家在采用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组织的管理技术后突然宣称有权在本地区参与瓜分中国时这点尤为正确。当非洲大陆和亚洲南部被纳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势力范围时,太平洋西海岸在世纪之交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日本在东亚的崛起

日本由四个主要岛屿和几个小岛组成。几个世纪以来,日本处在由封建领主(大名)和贵族武士阶层组成的封建寡头统治之下。日本自然资源缺乏、山岭崎岖,只有20%的土地适合种植,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所有前提条件。由于语言不通以及日本人对自己独特文化的强烈意识使得日本与世隔绝。到19世纪后半期,日本人仍然闭关锁国。这些原因似乎注定了日本政治上的幼稚、经济上的落后以及军事上的无能。但是,正是这些不利因素使得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在20世纪初成为了第一个实现现代工业并进入帝国主义行列的非欧国家。

1868年1月,日本爆发的政治革命推翻了封建寡头统治,以天皇为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力的象征,开始了所谓的“明治维新”。从此,日本便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日本活跃的新统治者掌握着政治实权,他们致力于把日本从一个原始的封建国家改造成一个现代世界大国。明治维新的伟大胜利正是因为新统治阶层愿意放弃过去的孤立主义偏见,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方法。明治政府的政治阶层认识到,既然欧洲国家是通过经济现代化、政治集权化以及军事组织化而成为世界大国的,那么最有希望抵制欧洲统治的方法在于采用这些措施,使其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能产生出世界大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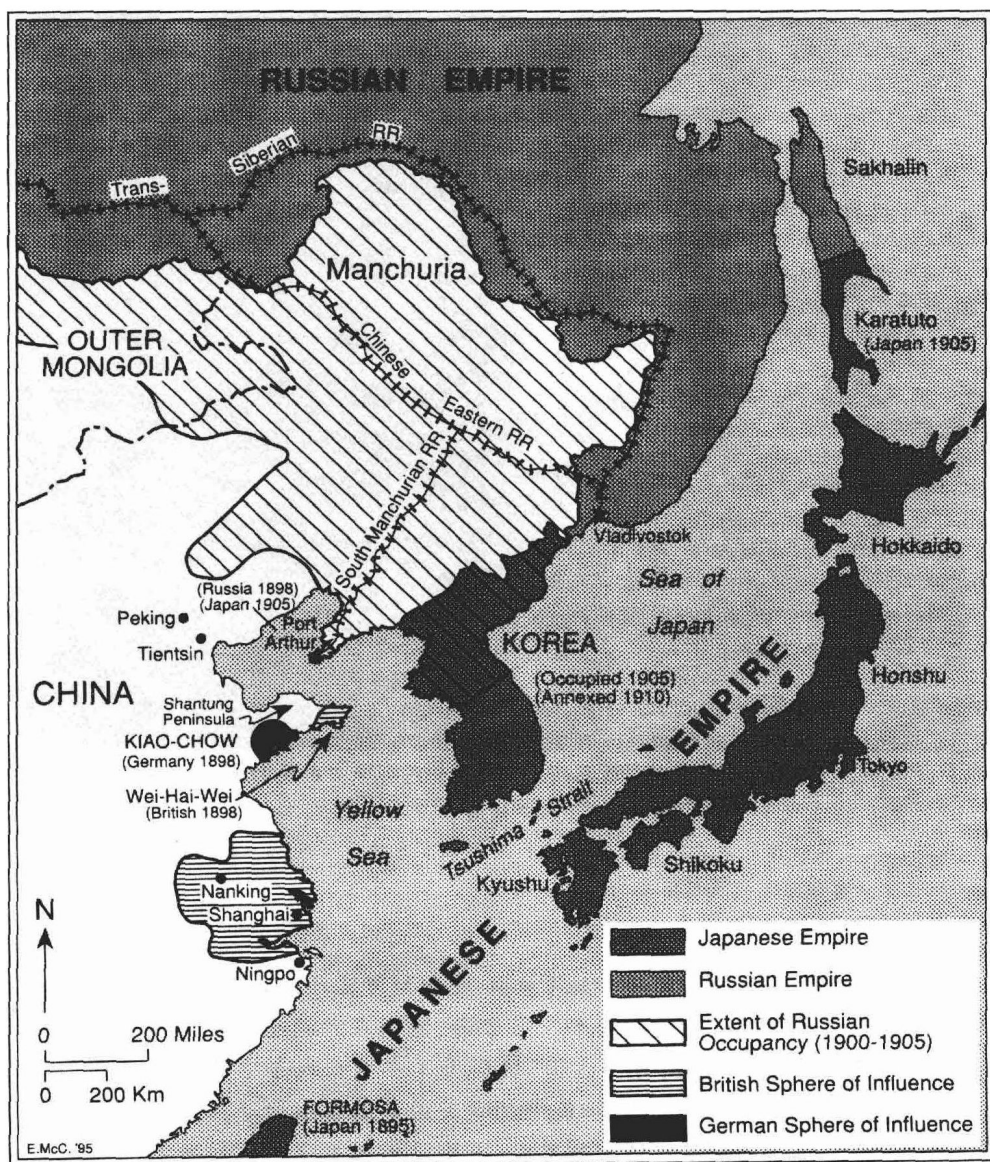
在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日本效仿西方进行改革,迅速地实现西方化。武士阶层改掉了把头发盘在头上的做法而纷纷留起了西方发型;欧洲服饰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873 年开始采用西历,并且重新规定了节假日。日本还派遣观察家到英国学习金融、商业和海军事务,到德国学习军事组织、战略和策略的原则,到法国学习法律和行政管理。从那时,日本便在这些欧洲模式的基础上重新调整了整个社会结构。政治上,那些大名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转移到中央政府,这个中央政府根据欧式内阁制组织起来,设有一名首相和两院制议会;军事上,曾是武士阶层特权的军事权力由日本帝国军队接掌,采用了普鲁士的普遍兵役制度;经济上,全国范围的银行和金融系统、交通和通讯系统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经济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一样,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生产纺织品。这个国家的丝织业在世界上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1910 年,日本的丝织品出口总额超过了中国,鉴于两个国家的大小对比,这是多大的成就啊!同时,日本的纺纱和棉织机械化水平迅速发展。到 19 世纪末,造船业和军需工业在日本建立起来。1900 年,日本的外贸额也从 1850 年的几乎没有增长到了将近两亿美元。

但是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受到了一些地理因素的制约。当日本进入其经济“起飞”阶段时,除了上面提到的工业原料和农业资源短缺外,它还面临着人口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人口危机。对一片比得克萨斯州还小的土地来说,人口的迅速膨胀(在世纪之交已经将近美国人口的一半)给土地和粮食供应造成的压力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障碍。19 世纪最后十年,日本的统治阶层认为克服这些妨碍经济发展的地理和人口障碍,其唯一的方法就是进行殖民扩张。欧洲经验再一次给日本提供了启发性的先例。正如英国通过夺取海外领土进行殖民、投资和贸易来缓解人口压力和提高经济生产力一样,日本也能在东亚相邻的无主土地上获得很多必需的工业和农业原料,开拓制造品市场以及安置过剩的人口。

在日本群岛以西不到百里,亚洲大陆、朝鲜半岛及满洲腹地对日本帝国主义情愫来说都是不可压制的诱惑。1894~1895 年,日军横扫朝鲜半岛进入满洲里,打败了中国军队,还通过保证朝鲜独立(在日本的经济统治之下)和侵占中国台湾岛,为其以后在大陆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做准备。正是这次大陆扩张使得这个亚洲暴发户第一次与俄国发生冲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时期俄国也开始在朝鲜半岛和满洲里进行经济渗透。1904~1905 年,两个国家终于爆发了不可避免的战争,这是 1870 年以来的首次大国间战争。海上,日本海军迅速地控制了旅顺港内的俄国小型舰队;陆上,日军打败了驻扎在满洲里的俄国军队。当 2/3 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经过九个月的航行从欧洲来到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时,遭到日本舰队的攻击并全部覆灭。作为这次重大胜利的回报,日本替代俄国享有旅顺港和辽东半岛的长期租赁权、获得在满洲里的特权地位以及成为朝鲜的保护国(1910 年直接吞并了朝鲜)。

基于许多原因,日俄战争成为现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日俄战争在近代史上创下了一个主要^①的非西方国家首次打败一个欧洲大国的记录。它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那些想摆脱欧洲统治的有色民族的新兴领导人。日本的经验表明这种依靠西方技术和军事组织的抵抗是可能成功的。在日本经验某种程度的鼓舞下,波斯(1905)、土耳其(1908)、中国(1911)相继爆发了民族起义。这些起义的领导人都主张进行西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来反抗西方的统治。在真正的意义上,1905 年日本战胜俄国标志着亚洲摆脱欧洲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斗争的开

① 阿富汗曾在 1842 年打败英军以及埃塞俄比亚于 1896 年击退了意大利的军事入侵。



► 俄日战争(1904~1905年)

始。在俄国,堂堂一个大俄罗斯帝国居然输给一个小日本的耻辱也削弱了诺曼诺夫王朝的统治。1905年俄国战败后,一场政治革命横扫俄罗斯,迫使沙皇首次批准宪法、召开议会以及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虽然这些让步被压制人民主权和民主权利的种种限制所抵消,但是一场潜在的革命风暴已经蓄势待发,并在12年后达到顶峰推翻了帝国统治。

从世界势力平衡变动的角度来看,俄国在远东战败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沙俄与其另一个敌人——英国的慢慢接近。既然它的扩张野心在东亚遭到日本的阻挡,沙俄政府便开始在其帝国另一端的巴尔干半岛重提领土要求并重振其影响力。但是在继续推行其在巴尔干的前进政策之前,俄国首先采取预防步骤,寻求与英国解决了它们之间在亚洲南部的长期争端;俄



► 俄日战争期间在旅顺港被击沉的俄国军舰:1904~1905 年俄日战争期间,日本海军战败了俄国远东舰队,并占领了位于中国辽东半岛旅顺港的俄国海军基地。此后不久,在津岛海战中日本海军消灭了从欧洲波罗的海的海军基地长途跋涉至此的俄国舰队。通过这两个国家的海战,确认了日本作为亚洲强权势力的到来。

英敌对的焦点在于两国在该地区的缓冲地带——波斯和阿富汗。这时,英国也迫切希望在亚洲南部与俄国达成协议以保证印度的安全。一方面,英国在欧洲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德国陆军和海军力量发展所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俄国海军在远东战争中的覆灭消除了英国忌惮俄国的一个主要源头;而德国成为了唯一能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潜在威胁。简言之,当它们在世界均势变动的背景下重新界定国家利益时,英俄这对历史上的死对头都把德国看成是阻碍它们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障碍。

1905 年后,法国积极推动英俄和解,它与英俄两国都保持着友好关系,并且是英俄接近的最大受益者。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磋商,英俄于 1907 年 8 月 31 日签订协议,解决了双方在亚洲南部所有的主要争端。俄国承认阿富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从而确保了英国长期寻求的印度东北边境安全。十多年来一直是英俄敌对爆发点的波斯被划分成三个区域:接近高加索并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北部区域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接近印度并守卫波斯湾入口的南部区域作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中间地带,包括波斯湾在内作为中立的缓冲区。双方同意共同阻止德国在波斯获得立足之地。虽然 1907 年的英俄协定只是解决它们之间在亚洲南部的争端,但是它为英国、俄国和法国三国间不断亲密的外交合作铺平了道路。观察家开始用“协约国”来称呼这个与由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相对抗的俄英法三国。俄国在与英

国友好解决亚洲南部的争端后,在盟友法国的外交支持和财政支援下,在远东遭致失败后“回归欧洲”。俄国重拾其在巴尔干的抱负,部分是出于转移公众关注上面所提到的国内问题的视线,部分是为了追求在该地区的长久利益,而这将必然地导致沙皇俄国与奥匈帝国及其强大的保护者德国之间的冲突。

当日本成为东亚的主导国家时,在太平洋另一端的一个非欧国家也走上欧洲道路并开始在全球新秩序下要求获得帝国主义地位。美国与日本的地理状况可谓是天壤之别了。日本不仅缺乏可耕农地和自然资源,也缺乏一个消费其工业产品的国内市场。而美国在19世纪的西进运动使得其拥有丰富的耕地、自然资源以及广大的国内市场。当日本苦恼于人口过多而向外移民时,美国却因缺乏人口而从欧洲输入大量的移民来经营农场和工厂。但是,在众多不同中,这两个国家为什么在20世纪初同时加入帝国主义行列的缘由却是相同的。第一,两国都远离欧洲军事力量中心而相对免遭国外入侵;第二,美日周边国家的政治无序和军事无能使得它们国内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了美日经济剥削和军事统治的诱人目标。当日本在亚洲大陆开始扩张时,美国在不受大国干涉又接近物产丰富、战略薄弱地区的共同促使下开始在本地区推行一项帝国主义扩张政策。

太平洋两岸同时出现两个强国,这无疑将增加它们的侵略野心和在太平洋碰撞的可能性。确实,两个国家都存在着跨洋扩张的主张。在日本,很多言论主张通过向人烟稀少的太平洋岛屿和美国西海岸大规模移民来缓解人口压力。到19世纪末,夏威夷群岛上就已经大多是日本人了。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定居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与当地具有欧洲血统的居民发生摩擦,他们提议制定排外法案。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选区要求跨过太平洋向西扩张。商业利益集团急切地盯着“中国市场”,希望能把美国过剩的农产品和工业产品销往中国;传教士则希望能够使中国大陆上的人们皈依基督教;美国的银行机构寻求参与欧洲财团筹备的满洲里铁路网建设资金重组;海军领导人则觊觎于萨摩亚群岛、夏威夷和菲律宾的天然海港作为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19世纪末,美国相继夺取这三个群岛后,在西太平洋给日本的帝国主义抱负造成了潜在的威胁。

然而在事实上,美日政府谨慎地搁置了双方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野心,而首先在临近区域进行扩张活动。尽管美国在世纪之交通过国务卿约翰·海的一系列声明,决心在中国建立“门户开放”原则,这两个崛起的太平洋大国达成了含糊的暂时妥协,消除了它们冲突的主要根源;美国默许日本对朝鲜和满洲里的经济渗透,而日本政府也接受了美国对日本移民美国的严厉限制。当日本把侵略矛头从太平洋转向亚洲大陆时,美国也调头转向了加勒比海地区。

美国在西半球和太平洋地区的崛起

美国与拉美^①国家间的国力悬殊是西半球的主要特点,它决定性地影响了各国之间的经

① 在这里,“拉美”指的是中美洲(包括墨西哥)、南美洲以及以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为官方语言的西印度群岛。